



●冉隆中
●郑海

红土高原的回声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

滇池，以及滇池之滨这片广袤的沃土，古往今来，曾使多少英雄豪杰为之心醉！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庄蹻就率大军来此。秦汉时代，秦始皇梦寐不忘这盛产银铜的宝地，汉武帝则经常引领遥望，竟看到彩云南现于滇池洱海之间！于是，从那时起，长江流域文化在红土高原播下了种子；逐渐形成了既有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又别具一格、瑰丽多姿的滇文化。

云南实在是得天独厚。这里不仅是有色金属的、植物的、动物的王国，而且，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的26个民族，拥有渊深富厚、精睿神奇，令人叹为观止的民族文化。太阳历、二进位制、阴阳五行世界观等竟都源出于此！以铜鼓文明为代表的滇池青铜文化，更使人不能不惊佩。云南民间文学也质量超卓：纳西族和白族的《创

世纪》、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阿诗玛》、苗族的《古歌》以及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等等，其艺术质量足以雄视寰宇，并不比《奥德赛》、《伊里亚特》逊色。

云南的书面文学在历朝历代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唐宋时期，南诏一些文人的作品被收入《全唐诗》，大理国出现了白文诗“山花体”，明清时代，云南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诗人文士，如杨慎、兰茂、孙髯、钱澧、师范等。他们写出了一批佳作。惜乎始终未能形成实力强、影响大的作家群。每思及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共和国诞生，盛世来临，云南文学终于崛起！五十年代，李广田、李乔、王松、刘澍德、公刘、白桦、苏策、彭荆风、杨苏、季康、公浦等诗人作家，列成闪闪阵势，响着隆隆足音，推出一批吹拂着壮美豪雄的滇池山风、回荡着神奇妙曼的民族情趣的传世力作，令中国文坛不能不刮目相看。

度过了说不完道不尽的六十、七十年代，一些老作家壮志犹存，宝刀未老，不时有佳作问世，一群新秀也先后脱颖而出。但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一种有特色的文学流派的挺立，是需要有成群的在文学观念、审美追求上相近的作家以成批的作品作声势浩大的集团冲锋的。

从七十年代之末开始，一大批生活积累丰厚、文学功底扎实而又泥土味十足的文学新人在滇池畔的沃土上默默笔耕，逐渐崭露头角。他们大多起步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令之时，对人生对社会有自己的思索。嗣后，中国文坛潮头竞涌、旗号杂陈、流派纷出。一段时期，为社会、为人生、为群众的创作道路被嗤之以鼻，认为不合时

宣，陈腐落后。但是，我们这一批土作家在短期的困惑之后，感到自己终究是红土高原的儿女，多姿多采的边疆、历史积存丰厚的 26 个民族，就象安泰的大地母亲那样，是自己血脉所系、灵感之源。表现 26 个民族的心灵和文化心理，展示他们的新生活、新追求、新意向，是自己的职责；继承并发扬光大滇文化，是自己的使命。这一批作家的风格、笔调和创作手法尽管千姿百态，但都辉耀着直面人生、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光彩，而且，滇味逐渐浓厚，红土高原格调逐渐分明。这就是“滇池丛书”得以形成的基础。

改革的时代，正酝酿并行将爆出气度恢宏的大作家和扛鼎传世的大作品。滇池之滨这一群辛勤的笔耕者志向高远，视野宏阔。在共同的追寻中，也许，下一世纪之初，新的老舍、茅盾、巴金，将从滇池之滨颖露？

当然，要攀登珠穆朗玛，必须有个锻炼体魄、精研技巧，选择线路的过程，必须有坚强的群体。滇池之滨，应该有一个目标明确、群策群力、优势互补的作家群落。春城的出版家们高瞻远瞩，与市文联一起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滇池丛书”愿和兄弟丛书一起，成为攀登文学珠峰的练功场和向峰顶冲击的营地。

热切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扶持、友人们的支持和读者们的帮助。

李必雨

1991.6.

目 录

滇 池
丛 书

序	李必雨(1)
一.面对新世纪的潮涌 (1)	
● 从徘徊到崛起	(2)
● 红土诗·边地小说 ·	
南疆儿童文学	(6)
● 三代同心和一体到多元.....	(11)
二.边地山水的宏大交响..... (15)	
● 地域·民族·世界.....	(15)
● 李必雨:独特的匠心和营构	(20)
● “造山”的汉子:黄尧	(31)
● 汤世杰笔下的高原世界.....	(39)
● 掘一口文学的深井.....	(49)
● 从叙写民族风情到	
刻画人物性格.....	(52)
● 困惑与突破.....	(57)
● 佤山木鼓·哀牢峡谷 ·	
景颇山梦.....	(63)
● 从都市走向山野.....	(76)
● 咬住青山 缠住大河.....	(82)
● 边地小说的新景观.....	(90)
三.都市里的喧嚣..... (97)	
● 城市小说:从兴盛到衰微	(97)
● 李霁宇:别具一格的趣意	(102)
● 好一个执着的黎泉	(110)
● 何真的“女性天空”	(118)
● 何群讲的城里故事	(127)

目 录

(1)	四.环绕于红土高原的旋律	(138)
●	走向沉寂的热闹	(138)
●	米思及和他的故乡土地	(145)
●	于坚:生命与人的现代变奏	(153)
●	淳真·淡泊·痴情	(160)
●	奇异的感觉与变形	(172)
(2)	五.山川风物皆是画	(180)
●	昆明散文创作的	
●	丰饶与贫困	(180)
●	杨明渊:散文之林的	
●	不倦耕耘者	(186)
●	高远清淡的美学追求	(190)
●	返朴归真与	
	建立“大散文”观念	(195)
(3)	六.得天独厚的高原儿童文学 ...	(205)
●	成功者及其三种走向	(205)
●	动物小说园地绽开的奇葩	(211)
●	不老的童心和童话	(219)
●	诗意图的寻求和美文的铸造	(225)
(4)	七.新群体·新视角·新思考 ...	(232)
●	昆明文学批评的	
●	新群体和新思考	(232)
●	充满激情的孜孜探求者	(238)
●	文化眼光·理论辨析	(242)
(5)	后记	(248)

你就是，谁来藏回自己，只如静怡人静默照故园。平十个
。我要你青长，我思暨得一夫耕得仓，春

一、面对新世纪的潮涌

今深踏进里头，那美丽不胜收，史氏袖学文碑易封尘。
始而自，为了瞻望明天，你把头抬高，朝天大喊，那脊梁神
韵，一次比一次抬得更高，而把阴影，落叶一扫，春华秋实，一派区中
以及苦涩的记忆，埋在深深的谷底，你不满，但默默无奇，是该去寻找那
那崎岖，你一直不停地错动，寻找着最佳的位置。
当历史翻过那沉重的一页，当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
春风吹拂过古老的高原的时候，有着悠久传统和历史渊源的昆明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花团锦簇的复苏和
繁荣的新时期。这是一个新人辈出，佳作叠现的时期；这
是一个观念变革，流派纷呈的时期；这是一个在迷茫中求
索，在探寻中奋进的时期；这是一个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
经验教训都同样引人注目耐人思索的时期。新时期的昆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已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如今，它基本划定了一个句号。面对本世纪最后的一

个十年，面对即将跨入的新世纪，我们回顾来路，展望前景，分析得失，梳理思绪，是有必要的。

从徘徊到崛起

翻检昆明文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珍藏着令前辈眷顾，令后人仰慕的一次次辉煌。远的不说，自抗战时期以来，在西南联大的旗帜下，这里曾集合过许多当时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巴金、李广田、刘澍德……一连串辉煌的名字，连同他们那些纪写云南生活的辉煌的作品，都将永远成为昆明文学史册上的一份骄傲；随着进军大西南的隆隆炮声，西南高原上走来了虎虎有生气的军旅作家方阵：苏策、徐怀中、冯牧、公刘、白桦、彭荆风、季康、公浦、周良沛、饶阶巴桑……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当时还显得较为年轻稚嫩，但恰恰是这一群充溢着青春活力的军旅作家，创造出了一大批令当时和后世为之侧目的反映云南边地生活的作品。云南边塞诗派在这里诞生，云南风情小说从这里起步，一批影响海内外的表现云南边地生活的电影作品，也在他们手中完成……几乎与此同时，开始崛起的云南地域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出现，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已崭露头角的一批名家的人盟，使五十年代的昆明文学创作格外引人瞩目。李乔描写大小凉山彝胞翻身解放的史诗般的宏篇巨制，李广田的脸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刘澍德表现滇池沿岸

变革时代新旧人物的现实主义杰作……所有这些成就，汇成了昆明文学的一座高峰，至今仍能使人感念怀想不已。

然而，骄傲也罢，怀想也罢，这一段辉煌毕竟已属于历史，已属于昨天。冷静下来，往深处想，我们不难发现，昆明文学历史上的繁荣与辉煌，基本上都是以外来作家为主力创造的，而极少具备自生本土性的特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身在宝山的昆明人，却常常面对一座座文学的富矿而感到茫然。缺少“土著”作为主体参与的文学繁荣，常常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由于各种原因，聚合于云南的作家又纷纷流失，五十年代那个昆明文学的辉煌时期也就随即宣告结束。并且，在那个时代的外来作家，对于云南边地蕴藏极深的文学富矿的采掘，应当说还是较为表浅的。他们中的部分作家曾以初识云南山水的激动和惊讶，描绘过热带雨林和村寨竹楼，描绘过险山奇水和乡风民俗。一些作品，因其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新旧对比的主题，既赢得了时代的社会的首肯，也赢得了古老而闭塞的云南民族地域以外的读者好奇的兴趣。当然，那个时代真正赢得读者、甚至引起过“轰动效应”的，是那些表现边疆各族人民求解放时的生死搏斗，以及由于民族隔阂而引出的部落仇杀等居于当时主流地位的作品。所有这些作品，除了他们共同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外，在艺术上往往还显得比较粗糙，对于云南边疆民族特色也还缺乏深层次的观照和思索。真正要深入全面地开掘云南边疆民族文学这座富矿，还有待于植根于云南土地的外来作家和属于这块土地的“土著”作家群的全面崛起和觉醒。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时期的到来，为中国文学的全面复苏和重新繁荣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当代文坛，各种思潮，此消彼长；各种流派，风起云涌。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文学新时期，虽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让人眼花缭乱，但细细梳理，它在初期也大致按照所谓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的基本方向而律动。刚刚觉醒的昆明文学界，这时与全国文学发展走向基本一致，也随着整个文坛争相上演的各种思潮而潮涨潮落。所不同的是，由于昆明乃至云南既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又在文化传统方面有其自身的复杂特点，因而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状态下的昆明作家，要依靠简单的模仿和借鉴去寻求自身文学的发展和出路，这就显得尤其艰难。在新时期最初的一些年头，昆明文坛在整个中国文学中所处的位置，基本是停留于颇为尴尬的“慢一拍”的境况中的。当时通常的情况是，当某些文学潮头在外地已趋于平息的时候，昆明的一些作家才开始幡然醒悟，面对自己那一堆未能赶上“潮头”的作品而叹息，而思索，而重新调整自己创作的路数。一位在当时活跃于昆明文坛的青年作家曾真切地描述过自己的这种尴尬与困惑：“……磅礴一时的‘伤痕文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已在全国退潮，读者已把更浓烈的兴趣萦注于美好的明天。而我的，在动乱年代亲眼目睹的许多惊心动魄的生活故事，简直就成一堆废物了。我赌着气写，大约有十几万字吧，侥幸‘溜’出去一两篇，发了。而更多的，只能老老实实地束之高阁。我仍旧试图迎头赶上。……我也怀疑过：如果生活里遇不到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叱咤风云的英

雄，遇不到乔光朴和明姑娘，遇不到特大洪水和熊熊烈火，我还能否写出好作品？还有没有必要死皮赖脸地挤到本已拥挤不堪的所谓‘作家群’里去厮混？”（周孜仁：《困惑与思考》《滇池》1984·10）处在这样一种惶惑不安、失去自信的心境中的作家，要想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困难的。在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矛盾心态下，昆明文学创作有量的繁荣，而无质的突破。以至于当我们回顾新时期昆明文学创作最初一段历史时，几乎很难找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重要作品。

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徘徊和摸索，昆明的作家、诗人、理论家和文学工作领导者一起进入了反思和重建艺术理想目标的时期。亦步亦趋拾人牙慧显然不是出路，返回五十年代再创文学奇迹也没有可能。昆明文学创作只有面对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红土高原的历史和现实，去认识红土高原和它的历史文化土壤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去创作出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具有“这一个”意义的作品，才能进而确立自己在文学大坐标系中的位置，找到昆明文学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出路。要重建符合上述规范的艺术理想目标，就不能不综合地考虑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多方面因素与文学的杂糅结合。基于大致相同的理论共识，并经过许多作家长时间的共同艰苦努力，一批体裁和题材不同，但都能从历史文化深层土壤中去发掘和把握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特殊个性、具有南疆红土地特色的文学作品，开始在昆明文坛脱颖而出，并且走出高原，受到外界的认可甚至高度评价。昆明文学也正逐渐摆脱困境，重新发现和把握住了自己的独特价值，从徘徊和沉默而开始走向崛

红土诗·边地小说·

南疆儿童文学

总起来说，新时期昆明文学的复苏和崛起当然是全方位的。但相比较而言，成绩更为显著，受到普遍称誉并发生广泛影响的，则主要集中在红土诗、边地小说、南疆儿童文学这几个方面。

春江水暖鸭先知。同中国新时期文坛复苏的信息最早是由诗人传达出来的一样，昆明文学走向繁荣、走向崛起的潮流也是由诗人掀起最初的波澜的。南高原曾经被称做诗的原野，这里曾经为新中国诗坛贡献出公刘白桦周良沛晓雪饶阶巴桑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新时期的昆明诗坛，涌现出了以米思及为代表的中年诗群和以于坚为代表的青年诗群，而两个诗群大致相同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追求，又结成了引人注目的高原红土诗派，并形成了以米思及、于坚、费嘉、邹昆凌、刘扬、彭国梁、王坤红、吴文光、拉木·嘎土萨、亚楠等为代表的诗歌创作队伍。评论家对此曾这样加以评说：“还是在 1982 年或更早的时候，诞生于云南红土高原的某些诗歌创作，就已经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抒情气质。而现在，这种被一些青年诗人私下称作‘红土诗’的作品，已从云岭之南走向全国，在当代诗创作中

占有了比较明显的位置。它所透露出来的接近南方文化精髓的意向，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至少，它在艺术领域内提供了一个不无意义的参照，那就是启示人们去打破以中庸静和思想为中心法则的超节制型的僵化文化状态，为恢复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生动活泼的生命性而努力。”（奔哥：《云岭之南，“红土诗”的诞生》）红土诗所流露出来的高原地域原初文化形态中那种朴素而强烈的自然崇拜观念，红土诗人所已经意识到的高原文化土壤中蕴藏的丰厚的历史，复杂的人生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红土诗派所形成的浑厚质朴雄健恢宏的美学品格，使红土诗从出现伊始既受到整个诗坛的注目。“在这类诗作中，隐隐约约的原初精神已凸现成可以感触的强烈情绪，诗人的内心感受穿透了风土人情、大山巨川的表层特征，直接辐射到红土高原巨大的磁心之中，以一种整体象征的方式去思索土地、岁月、人的历史。”正因为此，新时期昆明红土诗就明显地有别于五十年代出现于这块土地的军旅诗人和少数民族诗人的所有作品。昆明红土诗成为云南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精髓，已经和正在持续地发生着影响。红土诗的意义不仅在于诗歌本身，它对于重新认识云南文学的民族化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对于总结五十年代云南文学的辉煌成就及其时代局限，都不无裨益。

与红土诗接踵而至的是边地小说。它是新时期昆明文坛又一面惹人眼目的旗帜。边地小说的前身是云南民族风情小说。二者的易名，当然不能看做是一次简单的文字游戏。由民族风情而到边地，后者的涵盖更宽，也包藏着倡导者更为丰富复杂的新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追求。事实上我

们也已经看到，在边地小说的旗帜下，已经集结了昆明乃至云南小说作家的多数精华，他们放弃了简单省事的对风情民俗的摹写，而试图潜入到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层中，去实现创作的超越。边地小说的倡导，经由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刘锡诚、彭荆风等人的参予论争，曾在全国发生过较大影响。尽管论争并未形成趋于一致的结论，但它对昆明小说创作如何坚持民族特色，走民族化的道路却大有帮助。正如红土诗派只能是对一种总体特色的大致概括，而不妨碍每一位诗人各自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一样，边地小说也只能是一种并不十分明晰确定的创作口号，它可以也应该做出较为宽泛灵活的解释，它也允许甚至提倡昆明和云南的小说家去描写生发于这块土地的各类事件、各种人物——当然它应以边疆的、民族的、当代的做为它选材的主体。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最主要的形式，它自有一种文体的便利。它能够更为方便地触及和表现高原文化土壤的更深层次，能够更为细腻准确地展示民族历史的变迁过程和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我们在阅读李必雨、黄尧、汤世杰、刘祖培、吴慧泉、李霁宇、黎泉、何真、何群、马宝康、董秀英、存文学、岳丁、张庆国、徐刈、袁佑学、邹长铭等人的许多边地小说时，都能时常地真切地唤起这种感受。譬如苗族作家李必雨，因其独特的一段人生经历（他曾漂流异帮长达十余年）厚积薄发，创作出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李必雨的创作，大致也经历了一个从叙写风情民俗到刻画人物复杂性格、从经营独特的民族题材到注意在题材的独特性之外致力于对不同文化土壤及其由此形成的不同民族性格的揭示的过程，从而逐

渐形成李必雨较为个性化创作风格：地域和背景的特殊性（他常以中缅边境特别是缅甸一方为故事背景）、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他的作品因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性（特别是他笔下的掸族或克钦族女性形象，刻画得尤具个性色彩）。他的叙述语言，较为明显地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而具有简洁雅致的特点，他的小说虽然情节较为复杂离奇，但却注意把握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变化的内在依据，注意对细节的准确刻画，这就使他的作品与通常意义的俗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又如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和哈尼族作家存文学，他们都是来自各自民族的第一代作家。对于这样一些人口较少、文化传统相对较为薄弱的民族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显示出一种特殊意义。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努力以自己民族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最熟悉的生活和最熟悉的自然环境，或热烈真挚地对本民族纯朴而勇敢的性格予以赞美，或痛心疾首地对传统习俗的某些愚昧落后现象予以鞭笞，从而表现出各自作品的鲜明个性。他们的这些边地小说，是浮光掠影式的展览风情的文学所不能比拟的。

当我们在这里对边地小说的成就加以肯定时，丝毫不愿意对边地题材以外的尤其是表现都市和现代化生活场景的作品有任何诋毁之意。相反，我们渴盼和呼唤昆明作家能够早日创作出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相称的都市文学作品。这对于改变昆明乃至云南文学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对于推进昆明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的昆明都市文学还是在厚土层中挣扎的一棵弱苗，在襁褓中

蹒跚的一个婴儿。这是要在此顺带加以说明的。

当红土诗派和边地小说在喧喧嚷嚷的论争中崛起时，昆明文坛的另一枝新花——南疆儿童文学却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中变得枝繁花茂的。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聚集了沈石溪、乔传藻、吴然、刘绮、钟宽洪、辛勤、张祖渠、凝溪、康复昆、马瑞麟、赵克雯等一批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他们默默笔耕终有收获。佳作叠现，且多次在全国获奖，实践了他们冲出云南，走向京津沪，走进当代儿童文学史册的口号。这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群体正以其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魅力，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他们中，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乔传藻的儿童散文、吴然的儿童散文诗、辛勤张祖渠的儿童题材小说、钟宽洪、康复昆的童话、凝溪、马瑞麟的寓言都各具特色。尤其是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创作优势。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正经历着由人化的动物描写到追求动物本体价值的描写的变化过程。他的前一类作品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创作出了《第七条猎狗》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以及处于变化的两者之间的《象冢》等一些重要作品。但沈石溪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决心攀登更加奇险的艺术高峰。他借助于国内外动物学研究的许多最新理论成果，一改以往的创作模式和观察视点，而试图“把人类和动物、人性和动物性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考察探幽，从而使作品充满对生命哲学的新鲜见解，读来令人震颤、发人沉思。”他的长篇新作《一只猎雕的遭遇》及其他作品显示了他的这种崭新的艺术追求。他的新作《圣火》获得“1990年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友谊奖”，而他的长篇新

作又在儿童文学界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好评。沈石溪正以清醒的把握和勤奋的笔耕，在向着更高的艺术目标冲刺。

三代同心和一体到多元

新时代的昆明文坛，可以说是老中青群贤荟萃的一个大好时期。五十年代活跃于云南文坛的一批宿将，进入新时期以来，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宝刀犹利；当年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如今成为文坛中坚，正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而新时期又是一个新人辈出的时期，一大批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底都相当深厚的中青年作家纷纷走上文坛，一些少数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带着山野雄风登台亮相，许多人的作品出手不凡，显示了极大的创作潜力。与新时期昆明文学从徘徊到崛起的轨迹相一致，昆明文学创作的发展，出现了从一体到多元的新格局。如果说以往的文学求同的趋向较为明显，新时期的昆明文学趋异的走向则日渐突出，——各种风格、各类手法、各型式样的文学作品纷纷出现，显现出创作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在纷繁复杂的多种创作方法和流派中，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美学精神和主要创作方法，在新时期昆明文学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究其原因，这是因为：首先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中是古已有之。经过历史的积淀，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并培养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习惯。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具